

哀悼练习

(法国) 阿尔诺·卡特林

刘 晖译



阿尔诺·卡特林 (Arnaud Cathrine, 1973—) 出生于法国涅弗尔, 少年时代学习钢琴和声乐, 后赴巴黎专攻现代文学和英文, 15 岁开始写作, 迅速成为同代作家中的翘楚, 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音乐剧和电影脚本、随笔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作品多以家庭关系为主题, 描写痛苦的童年, 少年的危机, 兄弟和父子之间的伤害, 不可能的爱。他意图表明: 孤独、沉默、封闭、遗弃, 都无法遏制生存、成长、塑造自我、走出童年废墟的需要, 生活和爱的需要。由此, 他提出一种朴素而不颓废的生活哲学, 一种“战斗的悲观主义”: “在言外之意中, 在相遇中, 我的每一本书中都有对生活的要求。”他的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我”叙述, 但言说的主体是多声部的, 不透明的, 在日常生活的消耗中, 寻找自我的人物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虚弱无力, 对异己的他者和世界、甚至自我的异质性无所适从。他的小说常常以一个场景而非一个故事发端, 白描的笔触, 洗练的叙事, 口语与奥义交织的短句, 构成文本独特的张力。他的小说的风格是锐利的, 敏感的, 冰冷的, 可以说是极简主义的。

小说《哀悼练习》(*Exercices de deuil*, 2004) 由《波茨坦广场》和《懂事的年龄》构成。它可以是某种“双城记”, 或者双

联画：两段无法分割的叙述，关于两个连体的欲望都市——柏林和费城，两个互为镜像的年轻人——卡斯帕尔和安德鲁。无论是死亡还是出走引起的别离，都是哀悼的内容，凸显了丧失（或分离）的主题。作为城市的异乡人，主人公们想要寻找家庭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寻找他们失去的庇护，他们的根，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未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缺席或缺失之感来自童年的创伤，无意识的阴影。他们盲目地前行，不断地摸索，艰难地寻找并创造着身份，友情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但他们最终能够抵御社会的大洪水，免于漂泊和毁灭吗？两个故事，平淡，朴素，无头无尾，笼罩着哀悼气氛。

在《波茨坦广场》中，卡斯帕尔哀悼他的朋友罗曼。罗曼因在英国剧作家萨拉·凯恩的《费德尔之爱》中，扮演剧中人物伊波利特受到父亲的蔑视和侮辱，在声称去纽约的那个晚上，自杀身亡。卡斯帕尔继续在柏林生活，五年后开始给这个死去的朋友写信，他的独白近乎谄词。在《懂事的年龄》中，安德鲁不断地哀悼别离。为了逃离被社会格式化的命运，他离家出走，离开学校，抛下不再爱的女朋友，躲到格雷厄姆和德温这对同性恋家里，与周围环境、与学校教育、与他父母和哥哥代表的美国成功价值观决裂，拒绝被“统一和简化”。他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样，敏感、脆弱、善良，无法忍受家庭的虚荣、势利、伪善，痛恨制造“国家贵族”的社会再生产机制。他不断求索，认识自己，希望有一天找到自己。但他被不断的分离弄麻木了，陷入了恶性循环，他能期待什么样的未来？不懂事的为反抗而反抗的资产阶级少年不过暂时脱离了社会限制，如萨特所说，他“不受任何人支配，没家没业，无法无天”。但懂事的年龄不过是无限

被推迟罢了。懂事的年龄，意味着完成社会成人仪式，或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意味着严肃地参与被社会认可的游戏，严肃对待被社会指定为严肃的所有人和事。对游戏的信仰，对游戏的价值及其赌注的信仰，表现在严肃中。安德鲁不严肃。他像《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莫罗一样，没有社会野心，决心在客观和主观上成为不确定的存在。他拒绝过循规蹈矩的生活，不想“成功地获得成功”，他的反抗注定是无力的，他的无根基的出发注定是虚幻的。

译者

要是这没什么意义，那是因为你完全理解了。

——撒拉·凯恩

《渴望》

波茨坦广场

柏林

献给埃里克

献给“罗曼”

费德尔走进房间时，伊波利特没注意到她，电视和遥控汽车正让他忙得不可开交，遥控汽车撞向墙壁，立刻粉身碎骨。费德尔看到油炸土豆片的空袋子、脏袜子和脏短裤堆在一起。

“你真难伺候。古怪，无耻，尖刻，肥胖，消极，被惯坏了。你成天待在床上，成夜守着电视，你心无所寄，睡眠惺忪，天天

在这屋子里乱转，还弄出那么大动静。”

她爱他。他无动于衷并对此毫不掩饰。他不给她留任何希望。她哀求他。

我又看到费德尔走近你，跪下来，以一种极端屈辱的姿势，吮你的阳具。你继续看电视。高潮来时，你发出低吟，扳住她的头，让她全都吞下去。她站起来，哭泣着，最后你说：

“好了。没秘密了。”

《费德尔之爱》，萨拉·凯恩，第四幕，柏林工人剧院，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你父亲离开剧场，你母亲紧随其后。第二天，他给你写信，怒气冲冲地说你连个妓女都不如。

你把信给我看，你哭了。

你扮伊波利特这懦弱肮脏的角色，从未这么美，罗曼。

我提议你来我家睡。你把信撕碎了，扔在我乱糟糟的书房里。

我关了灯，你转向我，你说：

“这个演出季结束，我就走。”

“你说什么？”

“我离开柏林，卡斯帕尔。”

“好了。没秘密了。”三个月后，你走了。

五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给你写信。我很明白，你不会给我回信，但我继续这种独白，也许希望最终自己厌倦了，让你离去。

我给你写信，我不知道把这些信寄到哪里，我只好扔了。在我一个人即兴创作的这些延长符中，没什么会真正伤害我。没有。没你，我还是能应付得很好。

我在普伦劳茨山的房间里给你写信。你还记得吧，被漏水泡胀和弄黑的天花板，涂成栗色的墙纸——上面黄色花朵的图案给我们慰藉，带条纹的亚麻油毡和这种辛辣的气味，一切都照旧（修也没用，你说，几乎是摇摇欲坠了），我的小屋没窗户，像嵌在大楼尾部的一个凹室，这里空气不流通，我们在这里留下了晚熟少年的呼吸，我们的有点哈喇味的汗水，我们已经预备衰老的气息，这气息充满了即将来临的失败和失望。但人们不会为这一切感到痛楚：离别，诀别，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友好地解决。这是我们在私密生活中做惯的一件事，有点忘恩负义和乏味，没什么英雄气概。

于是继续前行。没有你。

你还记得鲁尔夫吗？恩斯特－布施戏剧学校的那个坏蛋。我们成功地让他以为我们俩是兄弟。这不难，想想很多人都上当了。我在 SO 36 酒吧碰到他。他总是问：

“你兄弟好吗？”

因为他跟我没什么别的话说。像你这样不在场的人有不可否认的本领，能让我们摆脱某些烦人的情形。我回答说好，还行。

“他现在演什么？”

我替你编造了莎士比亚、米勒或最近的：

“克里姆。你不知道吧？英国人。还不错。”

我独自品味我们的恶作剧。我有点心痛地对自己说，没人会问你在纽约的兄弟的消息。

我不像以前那样想你，我对这种想法并不害怕。我对伤口的温情并不比对伤疤更多。总得过去。

还留下某种类似猫的抓痕的东西。

你注意到没有，猫的抓痕从不会完全消失？伤口很少流血，因为太小了，但仍要几个星期才能愈合。最后，还会留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伤疤，关于一场失败的战斗的回忆。我把你看作猫在我手腕窝中的一条抓痕。有时，一只手来抚摸它。我说：是罗曼。我不试图解释更多，我很清楚，说到你时，我只是在自言自语。我承受住了你的离去，一种如此温柔的哀悼，无法诉说，无人分担。

我在波茨坦广场买了一所房子。我贷款十五年买下的。在这里，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还弄了辆自行车，好在晚上到克罗依茨贝格去，如此而已。

我很愿意把你带到他们都认为是声名狼藉的波茨坦广场。你什么也认不出来——一艘玻璃驳船凸出的前身在一幢红砖的摩天大楼附近漂浮，你在纽约想必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景象。他们想把这个变成住宅区，但没人信。除了我。说真的，我无所谓，我在这满是吊车和瓦砾的疯狂的杂物堆中间，感觉很好。

那片容我们长时间散步背台词的大空地，消失了。我留在了那里，离开了你熟悉的达达尼尔街的小房间。

显然，我怀念普伦劳茨山，酿酒厂的酒吧，我们过去在此地逗留，凝望着老啤酒屋的高高壁炉，按照某种节奏，一瓶接一瓶地喝，数年之后，这种节奏会让我们大腹便便。我想念黑尔姆霍尔茨广场，广场上的大树和不计其数的咖啡馆露天座；还有有轨电车，它晚上送我们回来，我们的眼皮沉甸甸的，心却因醉意而轻快。

在波茨坦广场，我觉得自己也已离开了柏林。但没你，我无法留下。

他们评价我就像评价你一样——一个离家的叛徒，一个丝毫不想归乡的流亡者。

你在纽约找到了什么？你仅仅是找到了吗？

一天早晨，我试着去找你。我想象自己找到了你在美国的地址。我们买了去圣弗朗西斯科的车票，租了一个便宜房间，我们沿着城市的下坡路一直跑到雾中的石海滩。

我也很愿意看到不同于柏林的另一个天空。我在蒂尔加滕骑自行车就满足了。我一个人背台词。

但无论如何，你在纽约的天空中看到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离开柏林？

黑暗中，我把手凑近了，好从你的香烟上借火。

你什么也没说。在我们中间，黑暗允许一切沉默；它就像一个借口，质疑它会是徒劳。

“要是我告诉你，我在这儿会感到孤独呢？”我执意说下去。
“要是我告诉你，你不考虑我就离开柏林，我恨透你了？”

你无言以对。

“我很清楚，两个朋友走到头，就像一块烂木板，我说出来，希望让你心软，引起你的回应。”

“你从没被你的父亲当成妓女。”

我感到你的手指滑向我的手指，轻轻地把几乎吸完了的烟夺了过去。你吐了一口。过滤后的辣味侵入我的鼻孔。

我没问你关于你父亲的事。很久以来，我了解你的内心，但我对你的事所知甚少。你从不让任何人卸去你的羞涩。

那晚我什么也没问你，后来也没有。没法指望你告诉我更多情况。我自问怎么能接受你的秘密。也许这些秘密由来已久。所以我们继续半遮半掩地给自己解释，接近你的谜面，掠过你的秘密的边界，也许这些秘密不是秘密吧。

我今后怎么办？我们两人曾经自作主张，从一处空房子挪到另一处，不依附任何人，酗酒，享受自由，告诉自己我们自满自足……你很清楚，你把我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柏林，还给了我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就是在没有你的情况下重新创造一切。你迫使我改变年龄，迫使我结束这轻率狂热的一章。你认为人需要长大吗？

有什么重要呢。你走了。

即使我得知你已经离开纽约，我也不会感到惊奇。或你准备就在此刻出发。这次的目的是在哪里？

整整两个月，我都希望你改变主意。晚上，你演出后躲到我这里时，我从你的动作中和表情上捕捉到一种转变的迹象。再说，我最终不再允许自己对这次离别发表任何看法，深信我无论如何也

不可能改变你的决定。我只是等待着，一个意味着你会想念我的信号，但又不太相信。至少是这样吧。但不是。我看到你封闭自己，意识到你准备放弃。于是我就像一个孩子，寻找并促成不爱之证据，埋下看不见的陷阱，以找到别人不爱他或不够爱他的证明；他自存测试的结果，并以此伤害自己，我觉得这种默默的清算有时会使他付出的爱逐渐干涸、萎缩，他因得不到这种爱而绝望。

整整两个月，我都被相反的情绪折磨：时而伤心，因为看到你提前摆脱了我，毫无悲伤甚至如释重负——我这么怀疑，我在沉默中强压怒火；时而相当漠然，意识到，久而久之，我会骄傲地忘记你，以最薄情的迅捷重新振作。我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些无时序的状态让我学会放手。你也知道这一点。与你在这方面一致，我感到耻辱。

今天，我想，人也许无法在缺失中爱。对一个朋友的爱到不了那个程度。

这么令人绝望吗？说真的，我总是不知道。

我问自己是不是取代了你。因为，是的，我是取代了你。可以这样说吗？

你无疑想到了几年中让我迷恋的人的数目；我总是这么意志薄弱。有些人刚出现就消失了，其他人留了下来。有些人六个月就绝交了，一天也不多。我甚至不再怨恨这些有时跟下流故事消失得一样快的友情。应该尊重我们在这些故事上所费的时间，别当别人的谈资。你，你在结束之前就走了。从此，对于自己记不得六个月中接触的女人或男人，我再不会于心不安。一个早晨，

就完了，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我们再无法让彼此失望。我们可以互相背叛，肯定不会让彼此失望。

坟墓是为了我们的眼泪而建造的，我们做不了别的；人们永远不会对坟墓感兴趣。我扔掉了一切让我想起你的东西——衣服，书和照片，我逃离普伦茨山的小房间，为了不住在我们的墓地里。

坟墓是沉默的，冷酷得令人绝望，像你一样。

换换环境就行了。

几天没见你的面，我问自己，是不是我求你留下的。

当格奥尔格·亨利希提议我在人民剧院重演伊波利特这个角色时，我先是听任他说了下去。这是在文化酿造厂的一个晚上。你已经离开四年了。他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你的某种东西让我凝望大厅的深处，我不知道这目光意味着什么。很久以来，我就梦想着跟亨利希合作，我不断地对自己说，与有意破坏这一切的念头斗争着。

“萨拉·凯恩？”我做了个鬼脸。“您没弄够？”

“《费德尔之爱》在柏林只演了一次，”他和气地辩解着，假装不知道我表现得像个笨蛋，在人家不会马上给他添的汤里吐痰。

“您还记得演伊波利特的罗曼·科尔勒吗？”

他当然记得你。

“无法超越，”我以一种断然的口气补充道。

然而，听到我把你捧到这么可笑的宝座上，你的幽灵毫不掩饰地开始冷笑了。

“我不能在罗曼·科尔勒之后再演伊波利特的角色。”

当然，会面之后我重读了剧本。

当然，我第二天一早就给亨利希打了电话。

费德尔：我喜欢看你自暴自弃。

伊波利特：这可不好看。

费德尔：为什么，你什么模样？

伊波利特：随便什么小坏蛋的模样。

最初排练的日子，按部就班。我很明白，我演的是罗曼·科尔勒，这根本也不适合我；我甚至以一种巧妙配比的受虐狂态度沉醉其中。每天晚上，我都祈求上天，不要让你看到这烦人的替身。演费德尔的玛尔达·沃勒曼，至少明智地用了平淡而小心翼翼的调子来朗读。

我们就这样用两个星期一遍遍地读剧本。亨利希观察我们，像一个潜伏的猎手，事实上，他准备把我们投放到舞台上，把我们交给一个我们尚不知道的真理。

你经常想到柏林，想到你的父母吗？要是你回来：什么也无法改变的令人不快的恐惧，你父亲的眼睛里总是没有原谅和理解，

你的眼睛里总是没有宽容和谦卑……

“似乎你很了解科尔勒。”

玛尔达喝了一口啤酒，看着我，确信她的话起了作用。

“你看过他演戏？”我问。

“他在戏剧学校的首演。”

“那时我们还不像。”

她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

“那是后来。人们开始把我们搞混。”

“少年人的把戏。”

“不，结对的把戏。久而久之，起保护作用。”

我叹气：

“我不该接这个角色。”

“昨天，亨利希对我说起你了。”

玛尔达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卡斯帕尔闹着辞职，他跟科尔勒较劲，但他没意识到，他终归是他自己。”

我的目光穿过玛尔达，一直到你。

“亨利希看过你演出，但他说，这次你整个人都入戏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

“费德尔对伊波利特谈起莱娜，他勃然大怒，命令她永远不要提这个名字。”

“我们能把伊波利特和莱娜那样的激情比作单纯的友情

吗……”

“你和罗曼，你们认识多久了？”

我还是抬起头。

“从童年时代……”

“那就是了。有可比性。”

“我没那么想他。”

“你的眼睛说的恰恰相反。他为什么离开柏林？”

“他从没跟我说过，我甚至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想他还会回来吗？”

我没回答。

“要是他来看首演，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喝光了啤酒。

“他不会来的，玛尔达。”

第二天早晨，我去机场接雷诺，我的法国朋友。

“你感觉如何？”

“很糟。每次都这样。”

“在巴黎，我都高兴地告诉别人，我来只是为了看你演戏！”

雷诺看着城市在车窗外闪过。

“我觉得从十二月开始变了……我不在的时候，柏林长大了。”

这话让我忽然悲伤起来。因为不管怎样，你也会说同样的话。你比随便什么人，比随便某个法国人更有资格。

到人民剧院时，雷诺在戏剧海报前停了下来。他大声念我的名字，自豪地朝我转过身来。

你走了几个月后，我认识了雷诺。法国使馆借翻译他的一本书的机会，邀请了他。

我对你说过，他像你吗？我花很久才承认这一点，好像这种巧合侮辱了我对他的感情。但我又能怎样呢？

我忍不住跟他谈这些事，他边听边看我的嘴唇，像他习惯的那样。他说他有点聋，通过读我的唇形，他更能明白。

这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跟你有同样怪癖的人。

“就这儿。”

我把他带到仍旧空荡荡的舞台上。雷诺注视着大厅。

“你觉得怎么样？”

“阴森。漂亮……吓人。”

“也许有一天我在这里演你写的戏。”

他转向舞台深处的布景。

“这是伊波利特的房间吗？”

我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倒在伊波利特坐在上面看电视的破沙发上。

“你跟我念尾白？”我开玩笑说。

“哪个角色？”

“费德尔……”

“你这个荡妇！”他夸张地念道。

“比妓女都不如……”我低语。

雷诺犹豫着：

“你有他的消息？”

我抬眼看大厅，我觉得，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成功地忘记了你。

雷诺走过来跪在我身边。

“接着来吗？”

我做了个肯定的手势。

“我想看到你自暴自弃，”他背道。

“这不好看。”

“为什么，你什么模样？”

“随便什么小坏蛋的模样。”

我们大笑。

“你演出穿成这样？”

他指着我皱巴巴的衬衫。

“我是一个破衣烂衫、又脏又臭的王子，你很清楚……”

我停顿了一下。

“你觉得在罗曼之后接这个角色怪怪的？”

他站起身来，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别想他了。七点了，你应该想自己。”

“我做不到，雷诺，我做不到。”

我低下头，缩到沙发角落里。

“别跟我说，你盼着今天晚上在这儿看见他。”

我没反应。

“我，我在这儿。”他接着说。

我对他笑了，很感激。他说得有理。今晚会有另一个兄弟，

一个新兄弟。不应该停下来，只需信赖前面等待我们的，这些走出阴影并占据我们心灵的面孔，在某些逝者让我们以为，我们全然被抛弃的时候。

忒修斯：伊波利特，儿子，我从未爱过你。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是你。上帝原谅我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是你，我永远不会——你明白，我不知道。

伊波利特：狠心的人。要是这种时候再多一些。

幕落。

欢呼。喝彩。

玛尔达看着我，她肯定以为我在黑暗中找你。你听到我今晚对你说话了吗？对你说话——我做的只是这个。

最后一次谢幕，大厅的灯亮了。我以一种焦虑的目光扫视着观众，显然你不在那儿，我暗想，我哪来那么大力气在一个月当中演伊波利特，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但你没再出现；我怎么会创造这个悲怆的王子，我对他感兴趣只是出于对你的回忆？

我拼命地想雷诺的面孔，为了不失去平衡，为了控制曾牢牢站稳但忽然要支撑不住的双腿。雷诺在那儿，在大厅的某个地方，为了我。我要离开舞台，快点冲个淋浴，我们两个将没入柏林的黑夜。

然而……还有他。

他在第三排鼓掌。你的父亲。这一次他一直待到演完。

他偷偷看着我，好像避开一束太强的光线。

我又感到一阵晕眩，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我们久久地对视着。

他最终摘下了眼镜。他把眼镜放进贴身的上衣口袋。他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眼神茫然。

我觉得他比我更难受。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在这个人的目光面前再也无关紧要。

一下台，我就倒在玛尔达的怀里。

她肯定以为我在为你哭泣。

我没跟她提你的父亲。

但很可能我在为你哭泣。

我们钻进被单里。

“他在那儿，”我终于说了出来。

“谁？”雷诺忧心忡忡地问。

“他父亲。”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没全告诉你。”我以一种生硬的口气接着说。

雷诺熄了灯。可能为了不让我有顾虑。

于是我开始讲。

五年前，你走之后的那个星期天，你父亲执意要见我。他跟我约在城中心的一家咖啡馆。

罗曼死了，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我没脱夹克衫，没拿出烟，感觉自己准备马上逃走。

罗曼死了，他说话的语气有多肯定，我的眼神就有多冷漠。你母亲守着屋子。他恢复了正常语气。他悲痛欲绝，在他的尸体被找到的地方，尸体完好无损，消除了悲剧效果；但是，他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了，生命结束了，尽管身体显出死里逃生的假象。我没问发生了什么，我什么也没问，蜷缩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夹克衫里，烟盒在我的胸口碾碎了，没用了，我们再也不会分享了。

是他执意要告诉我，我什么也没问。你没去纽约。出发的前夜，你从亚历山大广场的一个塔楼顶上跳了下去。

你不问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补充道。我回答说不。我不再需要解释。你带着一团永恒的影子再次出发，其实，这目光中的忧郁，就是你。最差的理解方式，我立刻想到，就是让你的沉默说话，既然这沉默是永远的。

你知道你身后留下了什么，是吗？一个根本无法弄清、无法抚慰的悲剧。

在《费德尔之爱》首演之前，我再也没见过你的父亲。我继续向自己讲述你这些年当中的故事。想象你差点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美国生活。我没对任何人说你死了（那些知情人，我离开了他们，让他们离我远远的）。那么，为什么今晚我把一切都告诉了雷诺？也许因为你们两人相像吧。

“我不知道在这一切之后说什么，”他小声说，背过身去。

“什么也别说，”我在黑暗中笑了。“好了。现在行了。”

我要立刻睡觉，忽然平静下来，像一个生病的孩子，被人看护着，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

有时，我一个人回来，我想象你坐在我的房门前。我走上台阶，你抬头看我，你手里拿着一角海报。晚上更迟的时候，你对我解释：你走上奥拉宁街，你看到海报贴在《枪炮与玫瑰》旁边。海报是几个月前贴的，广告已盖住了一部分海报。上面可读出我的名字，和《费德尔之爱》。海报余下的部分已被雨水或寒霜褪去了颜色，变白了。

现在，面对面，在楼梯里，你勉强有力气说出：我来得太晚了……我跪在台阶上，没关系，我轻声说，一点儿都没关系。

你随我来到房间里，我们先是沉默了许久，在说话之前互相凝望，先在沉默中辨认对方，确信就是我们，再同吸一支烟，把它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不知道我们两个谁会第一个触到过滤嘴并释放出这种辛辣的味道，这味道总是让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有点荒唐的秘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喜欢还是憎恶这些事情。

懂事的年龄

费城

献给热罗姆和塞德里克

献给塞德里克和热罗姆

我下了出租车，透过栅栏打量房子。

现在天黑了。

雪上杳无人迹。雪压弯了树枝。远处，树好像触到了屋顶。

我路过。

你想进来吗？

不。

你冻坏了。

就是冻手。

我不许你哭。

“站这儿等着，”格雷厄姆示意。

我脱下夹克衫，坐在他旁边。

“你睡那上面，”他指着阁楼补充道。

我仔细看了看房间的大客厅，好像是我第一次发现它。

“你在这儿就像在家一样。你知道，是不是？”

我表示赞同，一只手摸了摸沾满猫毛的长沙发。

“你就这些东西？”格雷厄姆发现我的小背包，吃惊地说。

“我走得急。”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然后冲上了开往拱门街的公共汽车。

我在格雷厄姆的碗里喝了一口洋甘菊茶。

“这玩意儿不好喝。”

“凯瑟琳知道你在哪儿吗？”他打断我。

“她会以为我搬到你们这儿了。”

“那你父母呢？”

我耸了耸肩。

“我假装失踪，”我最后说。

“你身上有钱吗？”

“我会弄到的。”

格蕾丝，这只灰母猫，过来蹭着我的裤子。我摸着它的大肚子。

“你多久没回学校了？”

“三个月。”

格雷厄姆不相信地撇撇嘴。

“六个月，我承认。不管怎么说，我没参加去年的考试。”

“开玩笑吧？”格雷厄姆扮了个鬼脸。

“我倒希望是。”

“你觉得奇怪吗，凯瑟琳……”

“你想让我这样下去多久呢？荒唐。”

“她跟我说了，”他执意说下去。

“说什么？”

“好像你整天盯着天花板。”

“我总是坐着思考。”

“谁说思考了？”

“行了。幽灵离开了天花板。”

“你十九岁了，安德鲁。这样毁掉一切有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格雷厄姆一眼，假装没听明白。

“你可以去法国生活一段时间，至少，你能练练……”

“然后呢？你看到我到那儿卖空调，变成我父母梦想的完美之

物？我的抱负比这大得多。”

“抱负？”

“对我自己想变成什么很挑剔。”

格雷厄姆摇了摇头，表示怀疑，他吻了吻我的额头。

“你真蠢。而且过分不成熟。”

他拿起碗，向厨房走去。

格雷厄姆和德温在他们那儿接待我不少次了，无疑也经常听我抱怨。他们对我了如指掌——我跟父亲、兄弟没完没了的争吵，我跟凯瑟琳的故事。我们差了二十岁。他们对我有点居高临下，如同面对一个过分的少年，这没什么奇怪的。无论如何，我暗想，他们是不是稍稍理解一点我完全没有抱负并因此日渐萎靡。我应该是第一个给他们提供这么彻底的反面例子、这么壮观的潜在失败的人。我自己也很难解释这一点。我不擅于成功，我只确信这个。

“哪天我去找阿丽姬。”

“我根本不相信你的话，”格雷厄姆反驳说。“你从没去过欧洲。而拉马拉……”

阿丽姬是希腊人。她两年前离开了费城，此后为联合国工作。我暗想是什么引她去了拉马拉。我从未问过她，因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冒失的问题。

“我可以吸烟吗？”

“可以，但你要开窗。”

外面，大榆树的叶子沙沙作响。数十只鸟在喧闹的混乱中逃

到了树上，混乱吸引着格蕾丝。她悄悄来到窗台上，开始贪婪地窥视它们。

“别这样。格蕾丝。你没那么强，没法全逮到它们。”

格雷厄姆倒在红沙发上，裹紧了一条摊在那儿的被子。

我吐了一口烟。他抬眼看了看我，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他经常这样，没有任何理由；格雷厄姆知道，他的微笑有种直接的力量。

他的头又落到靠垫上，他闭上了眼睛。

灯光暗下来，地板发出最后几缕褐色的反光。我们很快淹没在黑暗中——格雷厄姆和德温很少把灯全都点亮，也许这些灯的装饰太复杂了，灯光没法照亮大客厅。

我把烟头扔到拱门街上，我看它转了几圈，随后在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上弹起来。

进来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德温出现在客厅里。看到我在，他站住了。他明白了。

相信我只能这样：离开。从东到西穿过城市，在费尔芒特公园里奔跑，精疲力竭，像一只陀螺一样，人们唯恐见它又倒在一边，不断把它重新抛出去，它迟钝而多余——适合抛出去。

雪上杳无人迹。

一只鸟飞走了，它的翅膀扑闪着，我目送它。它滑入黑暗中，被黑暗吞没了。

我绕过房子。厨房的窗户缺一块玻璃。我朝这个黑洞俯下身。屋子里的空气似乎还要冰凉。我向前走了几步，看着自己的房间，哥哥们的房间围绕着它。窗帘空荡荡地吊着，中间撕裂了，在风中摇晃。它最终还是没掉下来。但我已经要走了。我看着这灰白的一片。还有中间的黑房子。

你想进来吗？

格蕾丝伸了个懒腰，我感到它的爪子压着我枕头上的前臂。它打了个哈欠，眼睛半闭着。

格雷厄姆从下面看着我们，手里端着一碗咖啡。

“几点了？”我结结巴巴地问。

“七点半。”

“我好像得了倒霉的咽喉炎。”

格雷厄姆忍住笑，指着浴室。我竖起耳朵。德温用一种可怕的假声唱贝丝·吉本斯的《榜样汤姆》。

格蕾丝小心翼翼地下了梯子。我俯下身，看它的身子在横档上危险地起伏。

“我永远理解不了它怎么能神奇地不摔跤。”

我套上一件夹克衫，跟着下去了。

“你怎么起来了？”格雷厄姆问道。“你想上学？”

“你做梦吧。我不困了，如此而已。”

我给自己倒了咖啡。

“德温从床上掉下来了，还是怎么了？”

“他跟他的教练跑步来着。”

我笑了。

“有问题吗？”格雷厄姆严阵以待地问。

“对不起，但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这么……井井有条。你们的生活，我是说。”

“最终或多或少总会这样。”

“在拉马拉不这样。”

格雷厄姆抬起头，看到我这么快就发起进攻很沮丧。

“让我也去那儿？这是什么主意！”

“别说这话，格雷厄姆。”

“因为我非得感觉自己在这儿生活有罪？”

“她走了，无疑因为她有充足的理由。”

“你今天打算干什么？”他不耐烦地打岔。

“在窗口吸烟，在书房给你写无数封抱怨邮件。”

格雷厄姆递给我一板药片，对我眨了眨眼。

“晚上见。”

他消失在过道里。

德温端了碗浑浊不明的糊糊坐下来，只有他知道这糊糊的秘方。

“你怎么能吃得下这个？”

“吃了有劲儿。那你打算去凯瑟琳那儿了？”

“只是拿回几件衣服……”

“你要去工作室？”

“当然不。也就是一刻钟的事。”

“你可以给自己弄个博物馆看，”德温提议说，嘴里还嚼着

东西。

“你烦我这样子？”

“你确实该找点事儿干。”

“德温，过去我父母为了让自己安心，拉我去参加一些所谓的文化活动，我避之不及。所以我今天就不打算逛费城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绘画，”他笑着说。

“与此无关。”

“你自责，因为你不喜欢绘画。”

“几点了？”

“去那儿还太早，我得告诉你。”

我坐在他旁边。

“说的是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在匹兹堡。我总会想起哥哥们着迷的表情，可是他们简直什么也理解不了，而且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能接受它。我的父母，我就不说了；他们一小时逛了上百个展厅，急着出去，但已是心满意足，以为他们给子女造了福……”

德温吃完了大杂烩，沮丧地看着我。

“对不起，”我又说，“我有时忘了自己是在跟一个美术设计师说话。不喜欢绘画有那么严重吗？”

“别浪费时间找证据了。”

“一般失败者没别的表现。”

他穿上了夹克衫。

“你知道去哪儿找我。”

我点了一支烟，倚在半开的窗边。我机械地看了一眼街道。

一个老头坐在一把椅子上。他非常专注地在看一本杂志。忽然，他的脸色变得严峻了，他开始咒骂。他撕下一页，揉成一团，放在脚下的塑料袋里。他接着看，然后他又咒骂，撕下了另一页。

他多次重复这绝决的、怒气冲冲的动作。我暗想这些纸上到底有什么。他想要这样去销毁、不让其存在的是什么？

我扔掉烟，离开了窗户。

这个人让我害怕，我觉得。

“他在外面吃午饭。您约了他？”

“我是他儿子。”

女秘书愣了一下，似乎放心了。

“半小时以后再来。”

我很清楚自己会受到什么接待。我对父亲的许多抱怨就包括他敏锐的洞察力：他非常明白我永远都成不了他儿子。充其量，他把我看作一个麻木的研究者，忙着写难懂而没用的文章。我跟他想说学法语，他专横地提出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在美国经济市场上有用得多。我没有屈从。此后，他习惯带着亲热的微笑贬低我，称我是“专职失业者”。我的两个哥哥簇拥着他，在我母亲衰老的目光注视下，她总是想不出办法为我辩护。

我的父母和哥哥们狂热地工作；尤其是我母亲，她除了要工作，还要管家务，快乐地把脚套进锁链。我一度想知道这个小世界到底把它的生命献给了何种高贵的经济交易。但我之后就把这事忘了。

我最终没机会像我的哥哥们一样，彻底地被格式化，变成一个真正美国制造的标准产品。我父亲的蔑视像砍刀一样当头落下：

没有完成那声名昭著的学业——没有，考砸了，无法挽回地自由了。我父亲很快感到蔑视是徒劳：我逃开了他。他没想到。由于被迫“变成我自己”，我不断自问是什么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去想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仅仅成功地成功了的人。我总是害怕自己被迫变成一个发育不全的人，一个看到抄近路会前景光明却不去那样做的人，因为他们的影子紧跟着我，让我寸步难行。

我在切丝纳特街角停下来。我父亲陪着一个客户下了汽车。他露出无可挑剔的微笑，这微笑像他的衣服、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无懈可击。我要以单薄的身形无动于衷地与之抗衡。

我朝他的方向走了几步。

他觉察到我出现，看着我，嘴半张着，好像一句话被打断了一样。

我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我们中间隔了三十多米。他的客户等待着，茫然不解。

一个戴领带的男子撞了我一下。

我转过身去。

“我叫吉姆。”

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了她的手。

吉姆长着男人的宽肩膀，刚硬的面孔。褐色的刘海几乎让人看不清她的眼睛。

“来杯啤酒吗？”

厅里空荡荡的，隐没在黯淡的光线中。在圆形柜台后面有一

排金属栏杆，姑娘们倚在上面，涂脂抹粉，好去挑逗客人。我在电视宣传片上见过这个……但意识到活生生的姑娘为网罗几个可怜的孤单男人，在那里搔首弄姿，我相当吃惊。

“两个人干活不算多。唯一的问题是，我本来想要一个更结实的男孩。”

我丝毫没有反驳，好像在迫使她认为这不是问题。

“我是唯一的白人，太太。您不觉得别扭吧？”

“叫我吉姆。你是大学生吗？”

我没回答。

“你多大了？”

“十九岁。我学法语，但我不经常上课。”

“来这儿干活，这想法有点怪。”

“我看到了门上的告示……”

“我还是跟你直说吧。我招了些姑娘，一来就倚栏杆的。你可以想见，这里的气氛有点特别。你知道台球台旁边的后厅吗？”

“不知道……”

“在那儿，是全裸脱衣舞。男人们有权手淫。但不能摸。”

“好吧，”我低声说，她把话说得这样详细明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它让我想起来另一个世界的图景。

“然后呢？”她问道。

“然后？”

“你在这儿干四个月活，把你弄崩溃，你再干什么去？我太了解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到那时，我可能上课吧，相信肯定有某件好事在等着我……”

“你有未婚妻吗？”

“现在我住在拱门街的朋友家。”

“离得不近。”

“别担心这个，太太。”

“我跟你说过了叫我吉姆。你晚上怎么回去？”

“我有办法。”

她叹了口气。

“有个新人来了三天了。克里斯蒂娜。拉美人，做得好。三个孩子。她丈夫出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人们很喜欢她。

她停顿了一下。

“可你看，安德鲁，她很难笑起来。”

吉姆看着我，似乎是在我脸上找到雇用我的理由。我低下头，不知道说什么。

“你明天开始干，行吗？”

凯瑟琳让一切都保持原样。我沮丧地看到房间里散落着我的书和衣服。我不知道该带走什么。似乎什么都不再属于我。我想把一切都扔在那儿。

凯瑟琳比我大十岁。她是吹玻璃工，在她的房子底层开了一个工坊。

我们相遇的第二天，我逃离了父母，住到了她家里。很正常地，我让自己相信，别的一切都不存在。然后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不是这样，一切都在我背后慢慢完结，于是，我重新出走，不明白是什么消失了，只是坚信，一种新生活的秩序抓住了

我，把我看成无赖，只要我还赖在行将完结的故事的温床上。

怀里抱着几件衣服，我朝凯瑟琳在她密歇根父母家拍的相片望去。我细细打量她的面孔，引起我无数美好而又烂熟于心的面孔。什么都荡然无存，我避开她的目光，反省自身的焦虑，我还强人所难地要求她的目光中出现一种不可能的纯真。

另一张面孔，我自言自语。

离开微不足道。不是吗？

但真正的出发并不总是勇敢的行为。真正的勇气从今天开始。

“安德鲁？”

格雷厄姆的黑影在通向阁楼的梯子高处被勾勒出来。

“你干什么？” 德温也咕哝着起身。“现在是凌晨两点……”

“别担心，” 他轻描淡写地说。“回去接着睡吧。”

德温走开了。格雷厄姆过来躺在我旁边，撑起一只胳膊肘。

“我刚才听到你抽泣。”

“抱歉。”

“你拿到报酬了？”

我说是。

“你想让我第一晚陪你到曼斯菲尔德吗？”

“我该自己应付。”

“德温喜欢这类地方。再说，可能更容易，要是我们在那儿……”

“啊，哦，你们经常去？”

“你了解德温，” 格雷厄姆悄声说。“他像加利福尼亚蠢货那样

尖叫，鼓掌，带着童男子的兴奋目光，把钞票塞到姑娘们的抽绳比基尼里。这属于他个人的怪癖……”

“我听见你说的话了！”德温从房间里喊。

“你为什么非要保护我，格雷厄姆？”

“也许你要的不是这个？”

“我是个混蛋。”

“你在这儿觉得烦，如此而已。你该不时到别处看看。”

“你这么说是为了赶我走？”

“别胡说了。我这么说是为了你。”

“我不适合在这儿生活。不适合。在法国也不适合。”

“你是个有点让人费解的男孩，安德鲁……”

“因为你觉得自己产生错觉了？你们觉得我总是冷静，有分寸……我不这么认为。”

“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没有，”我有点羞愧地承认。“他们什么也理解不了。”

“有一天，”格雷厄姆接着说，“我大约十一岁或十二岁，我盯着房间的墙，心想：这墙后面的人是我的父母，可我已经不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了。我们是陌生人。”

“但我，我爱他们……”

“我也爱他们，安德鲁。与日俱增。”

“你很早就知道你想成什么人，我反驳他。可我根本无法抵抗他们想让我加盟的那个完美阵营。”

“你以为这简单吗？要求与一个男人一起生活……”

“那我要求什么？”

“我不能替你回答。”

我弯腰从床头桌上拿起保罗·斯特兰德的书，这是我下午从凯瑟琳那儿带回来的。我把书递给格雷厄姆，翻到《青年》那张照片。

“他，他有一种天生的骄傲，”我说。“这是一名战士。他应该是贫穷的。在一座贫困的农场里。看他的眼睛：他要求另一种生活。他出生在一个还有可能性的时代。我在想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接手了父亲的农场，跟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生了五个孩子，整日呆呆地看着雾气消散，度过余生。”

“不用多说了。”

格雷厄姆笑了。我费力地想要模仿他。

“我担心自己永远不想再出发，格雷厄姆。我在你们这儿很好。我觉得自由。”

“这是因为你在两个同性恋家里……你可真有趣。”

“我承认，比在父母家多一点点自由。”

“别太挑剔。”

“要是我带个女孩来，比如……”

“啊，不，别这样！”他做了个鬼脸。

我拿枕头朝他劈头砸去。

格雷厄姆起身。

“晚安，小坏蛋。”

他慢慢下了梯子，回到房间，德温在等他。

雪上杳无人迹。中间是黑色的房子。

城市显得如此遥远。小时候，入睡前我总是这样自言自语。我让床头灯亮着，我的目光迷失在微弱的光线中。我发现生活遥

不可及：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后来我发现了什么？除了几张面孔，我在那里躲避被冻死的命运。

我在花园里走着，听着我的鞋落在雪上的微响。

我一边等着睡意，一边用手指来回摩挲房间里糊墙纸的图案。我描绘出一个复杂的、只有我知道的远景。于是，疲惫包裹了我，使这段过长的时光变快了。也许生活是为了明天的，也许我会在自己身上发现生活，结束这无目标的等待，这惨淡的失败。

我在想那只鸟飞到哪里去了，我来时听到它的声音。我在想，它来这儿干什么。

我不许你哭。

好好看着我。你会想起来吗？

“别生气，你会让我后悔打电话！”

“安德鲁，我真高兴，你自己打来电话，而不是让你的……你的朋友们来帮你打。”

“我需要时间，”我一字一顿地说。

我怨自己太孩子气了。

“两个月，可以说你给了自己时间。”我母亲叹了口气。“你有凯瑟琳的消息吗？”

“没有。”

“你真不想回家？”

“不想。”

“你愿意让人养着?”

“被凯瑟琳还是被他们养，我看不出区别。再说，还行吧，他们有钱。”

“靠他们的钱生活，你好意思吗?”

“我没靠他们的钱!”

“希望你和你父亲说几句，但今天他晚回来……”

“他跟你说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么?我差点去跟他说话，可我想起他很得体地断了我的生活费时，我就溜了。”

电话那边是无奈的沉默。

“就这样吧。我不想占着他们的电话不放。”

“我想他们有的是钱。”

“别用这种调子说话，妈妈。”

“至少你上课还不错?”

“再好不过。”

“我知道你想挂了。你亲亲我吗?”

“好。我亲亲你，妈妈。”

我去曼斯菲尔德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拱门街上的那个老头。他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一天的劳动成果：一些纸页被揉得皱巴巴的，上面那么多的名字、词语，忽然就不存在了，只是因为他这样决定了，因为生活在一个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切的世界里，会让他安心。他眉头紧皱，弯腰走着，穿着条过长的、磨破的、裤脚沾泥的裤子。他有时盯着行人，然后开始大骂。人

们惊跳起来，加快脚步。他们可能下一分钟就把他忘了。

每天，我都想偷他的袋子，把揉皱的纸展开，弄个明白；想在他的世界中，寻找我不知道的，比我们的世界更多的东西，或更残酷的东西。

通常，我晚上十点左右到曼斯菲尔德。知道酒吧所在的那条破烂的死胡同的人很少。它像是在城市中心被遗忘的一条小街，用来让狗撒尿和堆放街道垃圾的那种小街。

我进酒吧的时候，吉姆正在清点烧酒。开门之前，我要拖地。我费力地拖着，尤其在后厅，经常残留着精液的痕迹。但曼斯菲尔德积了一层污垢，吸收了洗洁精后马上就恢复原状。吉姆打开淡蓝色的小聚光灯。厅里于是产生了些微的梦幻感。二十二点三十分。克里斯蒂娜、苏珊和贝弗莉来了。她们换上了衣服。DJ 泰德入座，混音。曼斯菲尔德很快就要充满孤独，放荡者，熟客，也有一些舞女的女伴，她们来喝一杯，鼓掌，浅笑嫣然。

“你确定能行？”吉姆对我说。

“行。”

她又朝账本俯下身去。

“我跟你说过阿丽姬了吗？”

“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那个。”

“最近，她给我写信说，她再也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了。我经常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二十岁那年，我到爱尔兰去了，”吉姆开始讲。“那是‘血色星期天’的时代。父母好几个星期没我的消息。我别无选择。我

必须离开。城市对我来说是空的。这样我离开了。”

“然后，你干了什么？”

“我回到了费城。等我有了点钱后，再出发。”

“我肯定你十年来一直这么说。”

吉姆把账本整理好，好像为了中断谈话，我没有坚持。姑娘们在柜台后面与我们会合。

“小家伙很苦闷，”吉姆先说。

“他想着前任，”克里斯蒂娜暗示，一只手搭在我脖子上。

“承认吧：你给你妈打电话了。”

“不管怎么说，还好。”

“你要回去生活？”

“不，我跟男孩们生活更好。”

“他们倒是有胆量。”吉姆讥讽道。“要是我，可不掺和进去……”

“你在这儿还干别的吗？”克里斯蒂娜说，她像为客人准备餐具的人那样一丝不苟地整理着她的泳衣。

“我不跟您一起生活，感谢上帝。”

“他们也不，我声明。他们白天工作，我晚上工作。”

我叹气：

“我不能过他们的生活。我天生不能。”

“他又来了，”吉姆咕哝着。“我们能知道你是为了哪种生活而生的吗？”

“以前我经常做音乐。然后，不知为什么，我停下了。”

“收起你那老一套吧。”

“闭嘴，吉姆！”克里斯蒂娜替我说话了。

“我了解他，同情对他一点用也没有。好了，姑娘们动起来！是时候了。”

“你为什么约我到这儿？”凯瑟琳问。

“因为我在这儿工作。”

凯瑟琳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我可以在我觉得需要的时候，当着她的面开溜。

“你找到这工作很好，”她说在柜台边坐下。

“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安德鲁，别热衷不切实际的男人角色。”

“你喝点什么？”

“什么也不喝，谢谢。”

“要是我在另一家酒吧约你见面，你也什么都不喝？”

“我情愿你来拿走你的东西。”

我喝了一杯开胃伏特加。

“看，你在这儿很好，”她微笑着承认。“在柜台后面，我是说。”

“姑娘们对我很好。就是泰德时不时招人烦，但还好。”

凯瑟琳转向混音台。

“他自以为是了不起的DJ，实际上没什么。”我补充道。“他还不如去纽约别回来了。”

我悲哀地想到，凯瑟琳差不多第一次听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我们的谈话此后似乎只有通过尴尬的无意义词语才可能。

凯瑟琳抓住我的酒杯喝了一口。我见她这样心里很难过。一切都在这里，在这平常的动作上，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我们的过

去和曾经。

“你为什么不来工坊工作？”她提议。

“这不是我所说的结束一段故事。”

她发出不快的笑声。

“能不能请你试着委婉一点儿？”

“谈这个没法不用冒犯的词。”

“我觉得你可怜，而我一文不值。我们至少得顺其自然吧。”

“你不是一文不值。”

“你走的那个下午，我从没那么屈辱过。真没想到。竟趁我讲课的时候，到家里去……”

凯瑟琳又在我的酒杯里喝了一口。

“我不太明白我在这儿干什么。”

“我保证回去取东西。”

“当然不用。没什么要紧。等我找回点自尊，开始觉得你的所有这些痕迹都妨碍我的时候，我就把东西给你送来。”

“你真狠。”

我犹豫了。

“可是没别的办法可以重新站起来。”

“轮不到你跟我说这个，”她理由充分地回击。

“你明白为什么见你这么难吗？我没有权利安慰你。我只该让人忘记我。”

凯瑟琳凝视着我。

“我想吻你，我知道我不能。我要回去了。”

我也想吻她，找回她嘴里的味道。

“你请我吗？”她指着我的开胃酒说。

我挤出一个微笑。

“我等你的消息。我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了五个纸箱子。格雷厄姆的汽车就够了。”

她跟吉姆告别，吉姆点头回应她。

我看她走远，不让自己留住她。我闭上了眼睛。

你想进来吗？

不。

你冻坏了。

只是冻手。

我搓着手，在这里的沉寂中发出奇怪的声音。

别待在这儿。你看，一个人也没有了。

雪的白光什么也照亮不了，它假装耀眼，但它吸收了光，让夜深沉。

我离开。

现在，人们再也听不到我在雪上的脚步声，这注定要在我走后消失的印记。

“我在这儿从没见过这景象，”我低声说。

格雷厄姆和德温到窗边跟我会合。

“电台上说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就没下过这么大的雪。”

拱门街上的榆树好像虚弱的骇人怪物。我们只看见一层厚厚的雪。

“两小时之后，就只剩下泥了。” 德温说，他没怎么被这景象触动。

“我觉得你没意识到，” 格林厄姆说。“波士顿和纽约都断电了。四十八厘米厚……”

“还有十八人死亡，” 我补充。

德温已经走开换衣服去了。

“我父母家肯定很壮观。”

“他们有花园？”

“巨大。”

“你得习惯看这儿的雪。”

格蕾丝来到我们身边，像往常一样。我朝它弯下腰：

“树枝上再也没有鸟看不起你了。枝头空荡荡的。包括人行道。”

“费城干净了！” 格雷厄姆讥讽道。“朱利亚尼看到这个该高兴了。”

“这天气不能去干活，你说是不是？”

“你不想让我去？我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

“算我多嘴，我承认。”

“我得养活你。”

“闭嘴。要是你们时不时让我出钱就好了……你今晚去曼斯菲尔德吗？”

“尽量吧。”

“可别不守信用，格雷厄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够守信用吗？”

“算了，” 我笑了。“还是去给家里挣钱吧。”

到达曼斯菲尔德之前，我沿着河，朝着富兰克林桥的方向走。河水在积雪的两岸之间画出一条灰色的带子。我点了一支烟。冰冷空气中的烟味让我想起了我跟哥哥罗伊德来这儿抽烟的那些时刻。篮球训练之后，我们总是在桥下抽支烟。我们互相吐露虚假的秘密，骗人的艳遇，纯粹以充好汉为乐。有时我们竞相作假。我们假装相信我们的废话，相对于在房间里闷头用功，这是一小时的拯救。

我最后一次在父母家跟哥哥们一起吃饭时，大哥卡尔竟对我谈起了他在剑桥教的新课：市场营销策略。就像一只愚蠢天真的狐狸会来问候刚刚瞄准他的猎枪一样，我跟他们说，单单是这题目就让我恶心。于是，卡尔和罗伊德就把晚饭剩下的时间用来讥笑我没想好就说出的几个观点。不知出于哪种受虐狂的冲动，我把话题转向布什和他的可恶的德克萨斯州，我提高了嗓门，愚蠢地生起气来。我的哥哥们很快得出结论，我表现出一种因年幼和思想正统而产生的肤浅的不现实。我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辩护，最后气得脸色发白，两个男孩满意地看着我，就像看戏一样。我决心沉默，后悔这么直接。咖啡刚一上，我的沉默就生效了，大家责备我心不在焉，沉默寡言。

“好像你不高兴看到我们似的！”我父亲大声说，他像看狗打架一样听之任之，我想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上帝向他昭示了最弱者。

“别管我，”我还是开口了。

卡尔把身体转过四分之三，吹起口哨，盯着我孱弱的身体：

“想要别人不管你，就走远点。”

他指着隔壁的客厅。

我朝罗伊德看去，那无耻的犹大放声大笑，卡尔也跟着笑

起来。

“好了，好了，”我父亲出来收拾局面，他似乎不明白他刚刚失去了他的幼子——或他坚决同意自然选择。

我拥抱了母亲，离开了家。

一年过去了，我想。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哥哥，不希望这么快就跟他们说话。他们应该想念我给他们提供的消遣，但我不怀疑他们会到别处重新制造消遣。

我等着有一天，我将彻底地放弃，这残存的情感将离我而去，让我舍弃每次我看见他们就对他们寄予的希望。不再努力拯救他们。那一天，我身上再也没有可供他们行使权力的惯性，我不再只是可忽视的量，而是一个他们不屑与之说话的不可理喻的敌人。我再也不情愿顺从地把失败写在脸上——我会消除对他们的爱，我甚至也不以他们引我厌恶为乐，我要独行，不理睬他们，他们召唤我也是徒劳，他们碰到了忘恩负义之徒。

有两个世界，这真让人沮丧。有两个世界，我离开了你们的世界。我毫不敌视我来自的世界，只要它不妨碍我生存。我们将永不生活在一起。不是我拒绝你们的存在，是你们拒绝我的存在；我，盲目地，笨拙地塑造自己，如同一个白痴，被缚在地上之后，仍旧年复一年地企图行走。我甚至不想跟你们讨论，你们很可能用爱把我收回，驯服。

罢了。

我可能最终要评判你们。

来到桥下，我听到隆隆的汽车声。我扔掉了烟。烟头轻轻地落在冰面上。寒冷立刻攫住了它，像蜘蛛网一样包住了它。

我看到一个影子在黑暗中远去。

不是罗伊德。是一个陌生人。我独自在水边。我在那儿再也没什么可干的了。

“你一个人来了？”

“格雷厄姆累死了。他下班回来遇到堵车。下雪造成的事故。你给我来杯掺杜松子酒的橘子汽水？”

我与克里斯蒂娜的目光相遇，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吊在把杆上。客人们紧盯着她的挑逗动作。

“你能让死心眼的泰德换点别的吗？”她嘀咕着，“我说过我讨厌绿洲乐队。”

我对泰德做了个继续的手势。他扮了个鬼脸。

“你知道糟蹋生命的最可靠手段是什么吗？”德温问，声音中透着疲惫。

“你吃撑了，”我笑着说。“你从伍迪那儿来的吗？”

“我给你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安德鲁，”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看着我。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德温……你胡说还是怎么的？我还以为你喜欢这地方呢。”

我没留神，提高了嗓门。客人们盯着我看。

“我们以后再说，好吗？”

“我们永远都没法说！你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安德鲁？”

“住嘴！不该你说！”

“我三年后再来，肯定会发现你还待在这里。你跟这些傻瓜一样，特有本事，沉沦下去，却不痛苦。”

他笑了起来：

“你一点也不像战士。保罗·斯特兰德永远也不愿意变成你这副样子。”

“可你，你跟他们一样。”

我转过身去，看到克里斯蒂娜围着把杆旋转。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懒得在你那儿看见我？”

德温朝柜台俯下身来。

“根本不是，安德鲁。你没明白。我只是想跟你说，你弄错了。你不是干这个的。”

“你这话让人恶心。你说话就像一个该死的市侩。”

“可能是吧。不管怎么说，我不会让你在这儿。”

“德温，保持表面光鲜，坐在学校板凳上乖乖地等着永远不会到来的奇迹，真让我腻味透了。”

“你是在招待客人吗？”吉姆在我耳边低声问。

“你想让我怎样？”我接着说，好像没听见一样。“让我努力取得文凭，我们三个时不时绘个蓝图？你来这儿就为这个？”

“又夸大其辞了……”

“你真让我讨厌。”

我喝了一口他的掺杜松子酒的橘子汽水，对自己的长篇大论很得意。

这时我看见他从后厅出来，在贝弗莉怀里。

我父亲。

“你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两个月。”

我想象自己拿拖布清理他的精液——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数不清的兄弟姐妹正在令人作呕的亚麻油毡地板上蠕动……

“那你呢，你常来吗？”我问他，想笑，拼命忍住了。

“两个月没来了。我记得。”

我父亲一饮而尽。他一贯克制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低着头，他的黑眼圈和不安的眼神更突出了。我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强大。不错，这样更有人情味儿。

“那你不再住凯瑟琳那儿了？”

“是。”

“她妈妈给我们打过电话。”

“我不想知道，爸爸。随便你们组织什么烂聚会，没必要把我扯进去。”

“你为什么离开她？”

“我问你什么了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接着说。

“不，你不知道。”

我父亲把酒杯递给我，我又给他倒了威士忌。

“我猜你找到了工作。”

“但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吧？你怕蒙羞。”

克里斯蒂娜，刚刚跳完舞，在客人们当中走过，有意避开我父亲。我叫住她：

“喂！别忘了跟他要钱！他有的是钱。”

德温惊恐地看了我一眼，吉姆强忍着笑。

我父亲往她的胸部塞了五美元。

我觉得这场面让人安心。

酒吧的气氛恢复如初，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德温喝得尽兴，跟克里斯蒂娜情意绵绵地跳舞。大部分顾客都走了。吉姆胳膊肘倚在柜台上，跟我一样厌倦。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一起离开呢？”我向她提议。

她以眼神示意我闭嘴。

“照顾你的哥儿们去吧，别说胡话。他走路东倒西歪的。”

她走开时，我抓住了她的胳膊。

“说正经的。是什么把你留在这儿？”

我看得很清楚，吉姆无言以对。什么也没留她，若不是这阻止我们所有人离开的日常幻景。

“为什么你总说你要离开费城呢？是因为这回答能应付不少难堪的问题吗？我们两人一起走吧。去欧洲。我们干点儿什么，你和我。”

吉姆喝光了杯里的啤酒。她的粗暴忽然再也帮不上她任何忙了。她的眼睛穿透空虚，希望中断谈话。

“姑娘们呢？”

“什么？”

“她们到哪儿去？”

“好吧，这里比费城任何一间该死的办公室都有活力，可这真是你对我们抱的最大期望？”

“你为什么拿这个烦我，安德鲁？你知道我不会走的。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太过了。”

轮到我了，我自信地想，这自信忽然令我振奋。

“只是某种适合我们的东西，我坚持说下去。一间酒吧，或随便什么……”

“在欧洲，你根本找不到别的。美国小笨蛋，你只能找到这个。”

“我得说，你还能面对自己。”

“你在评判我？”她发火了。“你在评判那些姑娘？”

“没有。真没有。我只是看到，你對自己，对费城还有点儿敬意。而我没有。”

我最后看了她一眼：

“跟我走。”

德温关上了车门。我们乘出租车回去。他把胳膊勾在我肩膀上。他似乎酒醒了。司机通过后视镜观察我们。

“我们认识多久了？”

“感情上？”德温自嘲。

“是你把我搂在怀里的。”

“为了让司机恶心一下，”他小声说。“也为了道歉。今晚跟你说这些，我很蠢。”

德温停顿了一下。

“我们认识五年了，”他终于算出来了。

“你觉得我父亲很可怜吗？”

“谈不上。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要是你想知道我的看法的话。”

“我放心了。”

“为什么？”

“他们的故事太平静了，太简单了，我不相信。前段时间，我跟母亲单独待在一起，我想起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安德鲁，这话我只能跟你说，昨天我差点离开家。’”

“他们尽力了。就这样。”

“是，我知道。就这样。但这个，他们不愿跟我说。”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谈谈心，小子？”

“嗯？”

“格雷厄姆和我……”

“得了。我不愿意知道。”

“你看你什么反应！”他大声说，“儿子们什么都不愿意知道。”

“你和格雷厄姆之间有问题？”

德温犹豫着。

“安德鲁……”

“别用这种庄严的语气，我求你了。”

“我不会硬把你送回你父母家。我不是你大哥。要是你真想知道，那就是你跟我们生活一阵子对我们有好处。”

好像由于害羞，德温马上朝驾驶室俯下身。

“好了。您把我们放这儿就好。”

我掏出十美元。德温试图把我的手推开。

“别，”我坚持，“今晚是我父亲付钱。”

德温推开楼门。

“等等，”我迟疑地说。

我指着对面的过道。

“什么？”

我拉着他的胳膊。

老头靠着一面砖墙躺着。

我立刻看出他不是睡着了。他的头似乎被冰雪冻住了，他的脸颊也显出同样的惨状。

“我在这个区从没见过他，”德温注意到。

“我见过，”我勉强说。

我蹲下去。他没气了。

“他死了。”

“你说什么？”

“把你的手机给我！”

“你怎么看出来的？”德温俯身问。

“闭嘴！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叫了救护车。

塑料袋的提手从他紧握的拳头中滑落。只剩下很细的一条带子了。我看得清里面揉皱的纸团。

我无法把自己的眼睛从这具像死狗一样瘫软的身体上移开。

我夺过塑料袋。把其中的几页纸抚平。它们像玻璃一样碎了。上面有还能认出的一些曲线，收支表，一大堆费解的数字。

救护车来了。我们闪开。

我颤抖着，但不太知道为什么。德温使劲摩挲我的后背。我抽泣起来，他把我搂住。

我们待在一旁。他们确认了死亡，把他抬到车上。

“停电了。”德温进房间时说道。

格雷厄姆等着我们，裹在长沙发上的被子里。

房间湮没在黑暗中。他点了几支蜡烛，放在矮桌上。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嘟囔着，发现了客厅中央摆着的纸箱子。

“是凯瑟琳，”他打着哈欠回答。“她晚上过来了。”

格蕾丝占了其中一个，挺起它的小鼻尖，安静地看着我。

“你要一杯洋甘菊茶吗？”格雷厄姆笑着问。

德温向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别说话。

“安德鲁，好点儿了吗？”他担心地问。

我穿过走廊，来到他们的房间。我听到德温在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我脱了衣服，躲到他们的床上。

我又看到了老头无力的脑袋，他那让人以为还皱着的眉头，好像人们不允许他死得安宁一样。

我眼睛重新睁开的时候，我看到格雷厄姆和德温朝我俯下身。他们不知道说什么。

我在沉寂中低声说：

“睡吧？”

“我不会去很久。”

下了出租车，透过栅栏仔细观察着房子。

天黑了。雪上杳无人迹。

我父母跟哥哥们坐在桌边。还有个女孩。

我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停在厨房窗户后面。

我母亲出现了，她正在收拾。她就站在我面前，开始洗碗。忽然，她抬起头，愣住了。她离开洗碗槽，飞快地擦干手，转向餐厅；没人过来。她打开门。

“我路过。”

“你想进来吗？”

“不。”

我母亲朝我走了一步，不知所措。

“她是谁？”

“莫莉。罗伊德的女朋友。”

“我还以为是卡尔的。”

“她人很好。”

她抓住我的手。

“你冻坏了。”

“只是冻手而已。”

她揉搓着我的手。

“我不许你哭，妈妈。”

她闭目凝神。

最后她说：

“格雷厄姆和德温那儿，一切都好吧？”

“现在你叫他们的名字了？”

我看着妈妈，我真不知道自己此刻想要什么。她说什么才能救我们？

我凝视着这张美丽的脸，它得体地不再努力隐藏皱纹，让皮

肤在润肤霜的裂纹中若隐若现。

我很难过，她还在揉着我的手。

我把头转向屋里。我们像两个偷渡者。

“回去吧。会有人来的。我不愿意像小偷一样逃跑。”

我笑了，妈妈用目光询问我。

“我走了，”我说。“我就是想看看你。”

好好看看我，妈妈。你会记得吗？

她笑了，也许是因为有信心。她暗想，一股安静的水流经过旧河湾，最后会把我带到这里，在更明朗的天空下，在更安静的花园里。

我吻了她的手，把它放在我脸上一会儿。

我离开了。

我知道她没动。她等着看我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人们再也听不到我在雪上的脚步声，这注定要在我走后消失的印记。

(责任编辑：赵丹霞)